

论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彭平一^①

(中南大学 政治学院, 长沙 410083)

摘要: 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思想影响不仅表现在人权至上, 人格独立等民主主义观念上, 还表现在改造国民性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上。另外, 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新文化运动也为五四运动准备了一批鼓动者和骨干。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 民主主义; 民族主义; 教育改革

The Influence of Early New Culture Movement on the May 4th Patriotic Movement

PENG Ping-yi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influence of early New Culture Movement on the May 4th Patriotic Movement is manifested not only in the supremacy of human rights, personal independence and democracy, but also in the trend of nationalism aroused by the thought of remodeling national character. In addition, the education reform of the early New Culture Movement provides a beneficial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a team of advocates and the backbon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re prepared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Key words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May 4th Patriotic Movement; democracy; nationalism; education reform

开始于 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 与巴黎和会上山东权益问题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将两者混为一场运动是不恰当的。然而, 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否认的互为影响的关系。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关系, 特别是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对于五四爱国运动产生的影响, 是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然而, 新文化运动到底是怎样, 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爱国运动, 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这是大多数论者在论述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影响时首先要肯定的。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有论者表示了谨慎的怀疑。如有论者认为: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时, 新文化运动传播新思想只经历了

4 年多时间, 从当时传媒的有限影响力和传统文化强大的影响力考虑, 民主主义新观念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十分有限的。何况, 一种外来的新观念要转化为民众的内在精神, 并成为共同的行动支配力量, 更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1]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怎样评判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应该说, “一种外来的新观念要转化为民众的内在精神, 并成为共同的行动支配力量”确实是“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然而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对五四爱国运动产生影响, 并不一定采取直接对广大普通民众施加影响的方式, 更不一定要达到“转化为民众的内在精神”, 甚至“成为共同的行动支配力量”的程度。其实, 就是到当今社会也难说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已经完全转化为大部分“民众的内在精神”了, 更难说成为了大部分民众的“共同的行动支配

^① 收稿日期: 2009-06-19

作者简介: 彭平一(1953-), 男, 湖南长沙人, 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力量”。我们只能说，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只是影响到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再通过他们利用这种新思想和新观念来发动一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更何况，使民主主义新思想和新观念得到较广泛传播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开始于1915年，但在此前——至少在辛亥革命酝酿期间——这些新思想和新观念其实已经传入中国，并开始对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使这些新思想和新观念更加明确，使其影响更加广泛，并开始形成一种知识分子比较广泛认同的价值观。

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以及对孔教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使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受到西方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洗礼的青年学生不再相信和服从于任何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是思想的还是政治的。特别是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民主主义者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实际上是对当时政治权威的挑战，从而使北洋政府的声誉和威信下降。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就指出：“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这里所指的“三年以来”的专制政治，显然是指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然而，袁世凯死后，“共和国体”和“立宪政治”能够真正实现吗？陈独秀表示了极大的怀疑：“自今以往，共和政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2]14-15}可见，他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当时的政府身上，而是寄希望于国民民主思想之觉悟。这种对政治统治的公然挑战，无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标志之一，也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爱国学生将抨击的矛头直指北洋政府和整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广大知识分子意识到争取国家的主权不能靠独裁专制的北洋政府，而必须依靠广大民众。因此，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陈独秀认为国人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觉悟”，即“（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从这两种彻底觉悟，他又提出两大宗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3]于是，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中宣传的民主政治理想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与实际

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学生们不仅喊出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而且将抨击的矛头直指北洋政府和整个统治阶级。在“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中出版的《青岛潮》一书，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指出：“大抵今日之大小官僚名流武人政客奸商劣绅土猾，其心亡者滔滔矣。所未亡者，则我纯洁之兵农工商男女学生教员，尚能诚乎爱国，不肖者占极少数焉。夫以吾同胞之众，大小官僚名流武人政客奸商劣绅猾殆居最少数。苟使我男女学生教员及兵农工商，均能起而自卫，则又何患彼少数之大小官僚名流武人政客等等不从我为善耶。”并认为，“吾国官界，为世界一大制恶场”，甚至说“北京专制魔窟也，卖国党巢穴也”。在五四的学生游行过程中，北京政府的步军统领李长泰禁阻学生游行时说：“有话尽对我说，不必如此招摇。”学生中“竟有答以官界中人我们不信任者”。^[4]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使广大青年学生有了强烈的民主意识和对权威的怀疑态度，才有“五四”爱国运动中学生的爱国行动。正如周策纵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思想改革家反军阀反列强的理论基础正是早先一群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民主思想。”^[5]

新文化运动中宣传的人权至上、人格独立和自由平等等观念，对“五四”爱国运动中青年学生的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中宣传的“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独立、自由、平等以及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观念。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大力宣传人权至上、个性独立和思想自由等观念。陈独秀提出“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忽为他人之附属品”，号召青年“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6]11-12}胡适主张“发展个人的个性”，要求“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7]李大钊强调“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呼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8]这些思想的宣传无疑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正是把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游行示威当成自己的权利，把发表反帝反专制的言论看作是思想自由。当时，太原街头就出现如下帖报：“请学生继续民众运动，请报界发表民意，请当道提倡民气，不要摧残了青年爱国心！”^[9]在上海的一些报刊上也普遍认为学生和民众的爱国行动是“真正的民意”，是“神圣的民意”；有的还认为：“个人有个人的人格、自由权、爱国心，千万不可

以人的意思为己的意思,人的举动为我的举动,一定要服从我良心上的命令,就是我要表示我的决心。我的决心是国贼未除,学生未放,宁死不做工”。^[10]这些言论都是把爱国运动与个人的权利和思想自由联系在一起,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思想影响。正如周策纵先生所说的:“与这个运动有关的许多重要的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觉察到他们的运动的真正精神并不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与民意至上、人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等观念密切相连的”。^{[5]5}

二

在论述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时,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而忽视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而形成的另一重要社会思潮的影响,这就是改造国民性思潮。

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民主主义者在探究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认识到,没有合格的共和国国民,没有“多数国民”的觉悟,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陈独秀指出:无论是维新还是辛亥革命运动中,都只有少数人在与封建政府“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6]11}在这种国民“惰性过强”的状况下,当然不可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共和国”。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1]216}而要造就合格的共和国国民,首先必须使国民具有“国民之思想人格”。同时,在批判孔教和封建礼教过程中,激进民主主义者看到孔教和封建礼教最大的危害在于养成了人们的奴性和劣根性。因此,由民主和科学的启蒙,对孔教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合乎逻辑地引导着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国民性改造问题进行思考,从而形成了继辛亥启蒙思潮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高潮。

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解固然超过了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理解,已经开始从个人价值的角度来理解民主、自由、人权。但他们仍不自觉地将民主与民族、人权与国权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在对传统国民性的弱点进行批判时,较多地将国民的奴性和服从性太强与国家民族意识不强联系在一起。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2]16}在这些激进知识分子眼中,这种中国传统国民劣根性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国民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对东西方国家的民族性进行了比较,他对西洋诸民族的民族性大加赞赏,认为“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如果这还是从个人价值的角度立论的话,那么,如下的赞赏就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色彩了:“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其力抗艰难之气骨,东洋民族或目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处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11]显然,这种对西方民族性的赞赏与对东方民族性的批判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偏颇;这种对“好战健斗”和“以鲜血争自由”的偏颇赞赏,隐约透露出其与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一度出现的偏激情绪所存在的某些联系。

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谈及进化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进行东西方国民性的比较,在他看来,“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他把西方一些民族国家的“青春”国民性,与中国的“白首”国民性比较,突出了中国的民族危机。然而,他又告诫青年:“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齟齬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

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12]³⁷⁻³⁸他把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焕发“青春之朝气”上，这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些青年导师的宣传鼓动下，五四前，在青年学生中也产生了一股对国民性进行反省和试图改造的思潮。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社”主张“思想革命”，其主要内容就是革除“中国人的思想中的三种毒素”，“变奴性的思想为独立的思想”；“变专制的思想为平民的思想”；“变昏乱的思想为逻辑的思想”。^[13]另一学生社团“国民杂志社”明确以“增进国民人格”和“灌输国民常识”为其四大宗旨的前两条，^[14]并得到蔡元培的明确支持和鼓励，在《国民杂志序》中，他写道：“求能助此少数爱国家，唤醒无意识之大多数国民，而抵制椽丧国家之行为，非学生而谁？呜呼！学生之牺牲其时间和必力，以营此救国之杂志，诚不得已也。”不过蔡元培对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国家主义思潮抱有警惕，他在鼓励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同时，又告诫说：“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德意志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15]这种告诫和提醒正从反面说明了当时青年学生改造国民性的思潮中确实有一种对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相互关系认识模糊的现象。

正是这一改造国民性思潮激发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侵略权益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消息的刺激下，成了支配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机。陈独秀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中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提到的改造国民性的诉求，更进一步将其民主主义的主张与民族主义的诉求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强力拥护公理”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两大宗旨。因为“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而列强又“都是强横不讲公理”，所以各国的平民只有“用强力将他打倒”，才能使“公理昌明”；因为“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

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这正是“少数人垄断政权”造成的，因此“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见”。^[3]这两大宗旨以后就成为五四运动爱国学生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两大口号的理论注脚。

三

同时，新文化运动还为“五四”爱国运动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上述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深入发展实际上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社会条件。除此外，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改革，实际上也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特别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北京大学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摇篮和中心，从而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社会环境。

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是在1916年年底。他在北京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毫无疑问，这一办学宗旨是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思想在教育思想方面的集中体现，也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根据这一办学宗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京大学一改原来思想保守、校风腐败、生活散漫的局面，成为当时思想最活跃，学术风气最浓厚的高等学校。在“兼容并包”思想的指导下，蔡元培聘请了政治立场不同，学术专长各异的许多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除了后来形成新文化运动骨干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外，还有一些属于旧文化营垒中的知识分子，如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这样就使北京大学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学术观点上都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场所。这对开阔学生的视野、激活他们的思想无疑是很有好处的。特别是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后，把原来创刊于上海的《青年》杂志迁往北京大学，这使在北京大学形成一个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知识分子的联合体成为可能。《新青年》从第三卷开始在北京编辑出版。此前，《新青年》的作者主要是陈独秀和章士钊办《甲寅》时的作者。但是从第三卷开始，加入了许多新的作者。这些“新加入《新青年》撰稿的作者，几尽是北京大学的

教员和学生,第四卷尤其明显”,^[16]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王星拱等。这“表明陈独秀进入了北京大学主持文科后,《新青年》杂志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得到当时全国最高学府一辈教授的加盟,声威大盛,而《新青年》也成为了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一刊一校为中心的新文化倡导力量因而形成”。^[17]这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就成为了后来“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

另外,胡适还扩大了北京大学的招生。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前的1916年,北京大学招生为1333人;到1917年,即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年,就增加到1695人;1918年又增加到2001人;1919年春季学期就招收了2413人。^{[5] 63-64}其中在1917年暑假,“北京大学连续地招生三次,及格的就录取,不受名额限制,这样也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也使有些学生意外地得到了投考的机会”。^[18]当然,这也是北京大学学生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成为先锋和骨干的重要条件。

胡适还对北京大学的教学和学生管理进行改革,主张学生也应该进行自由的学术研究,并应该有“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他认为,原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之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19]因此他大力提倡和鼓励北大师生组织各种学会、社团,以引发他们研究学问的兴趣。他不只是一般号召,还亲自参加组织和鼓动。据不完全统计,在蔡元培的提倡和推动下,“北大成立的各种社团有27个”。^[20]这些社团包括进德会、新闻研究会、国文学会、历史学会、哲学研究会、地质学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研究会、国故月刊社、孔子研究会、数理学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美学会、体育会、消费社、学生储蓄银行等。这些社团,有些是以研究学术或引起学生研究学术兴趣为宗旨的,如国文学会、历史学会、哲学研究会、地质学会、数理学会等;有些社团是为陶冶性情、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如体育会、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些社团是以培养学生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如平民教育讲演团、消费社、学生银行等。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社团,都锻炼了学生的活动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群体意识。蔡元培还认为,政治组织与学校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关系,但是20岁以上对政治感兴趣的学生可作为个人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学校可以为他们提供咨询,但不应干涉他们

的自由选择。因此许多北大的学生参加了一些政治性的学生社团,如1918年5月成立的学生救国会,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起到了骨干的作用。这为学生参与社会上的政治活动提供了方便,当然也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发挥骨干作用提供了条件。

另外,北京大学还鼓励学生自己创办各种刊物。当时北京大学有号称“鼎足而三”的三个刊物,即《国民》《新潮》和《国故》。这三种刊物虽政治立场各异,但都反映了北京大学学生追求学术和思想自由的精神。这三个刊物实际上又形成了三个社团,即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和国故月刊社。蔡元培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对这些学生社团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国民社、新潮社的一些主要成员都积极参与示威游行的筹备工作,并在“五四”的行动中起了骨干作用。如1919年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举行了北京各大专学校代表的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和布置第二天的游行活动。“会议主要是由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成员主持的”,国民杂志社的领导人之一易克嶷担任了会议的主席,《新潮》月刊的创办和编辑者之一罗家伦是“这次集会的负责人之一”。^{[5] 133-135}由此可见,正是由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使北京大学形成了思想活跃、社团活动频繁的局面,并对北京的其他高校乃至全国的其他地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使北京大学不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摇篮。

四

新文化运动也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准备了一批鼓动者和骨干。“许多在鼓动示威、罢工、抵制日货等活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人,实际上也是那些推动新文学、新思想以及社会改革的新兴知识分子”。^{[5] 5}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最能够被称之为“推动新文学、新思想以及社会改革的新兴知识分子”的人无疑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高一涵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人。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通过激发学生对中国时事的兴趣,使他们对当代世界的现实有所意识,从而促进了运动的发展。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五四’游行的建议,但是这一群人中的好斗分子宣称,青年应当担负起监督政府的政策、实行社会改革的责任。从这个角度看,‘五四’游行可认为是

这些新知识分子领导者教导的逻辑结果”。^{[5]237}事实上,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了支持和鼓动。“五四”爱国运动前,陈独秀就多次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对中国的政治问题要采取“直接解决”和“根本解决”的方式。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后,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从5月4日到6月上旬用全部的版面来报道运动的发展情况,他自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所谓“公理”的虚伪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本质,甚至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两大宗旨,这些言论对爱国学生无疑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李大钊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本质,提出“改造强盗世界、反对秘密外交、争取民族自决”的三大信誓。^[21]陈独秀在运动中还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这一宣言由胡适译成英文,陈独秀和高一涵到印刷所印刷出来,并和李大钊一起去散发。蔡元培虽然是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也表示了理解,并没有阻止。在爱国学生被捕后,蔡元培积极进行营救。蔡元培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校长对北洋政府逮捕学生表示了抗议,并向北洋政府辞职,这也给了爱国学生很大的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因此,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更重要的还在于,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些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起到了直接的发动和领导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对青年寄予了很高的希望。陈独秀之所以以“青年”命名他创刊的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的文章就是出于对青年的希望。他在《敬告青年》中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希望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和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之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22]李大钊也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号召青年“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12]42}这些充满激情的言论无疑激荡着青年学生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就是这些青年学生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团体。胡适、陈独秀、李

大钊、周作人等对新潮社的建立起了很大的鼓励促进作用,胡适还担任了这一团体的顾问。而新潮社和其他一些学生团体的主要骨干,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都发挥了很重要的骨干和领导作用,如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罗章龙曾经回忆,五四时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23]而这个小组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上所述,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确实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实际影响。就思想影响而言,我们强调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思想影响,但丝毫不意味着否认其他思想,包括中国传统思想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另外,还必须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思想影响并不仅仅是以往所强调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由改造国民性诉求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应视为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一;同时,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也包括一些负面和消极的影响。唯此认识,才能理解五四爱国运动性质和意义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 [1] 陈廷湘. 1920年前后两次争国权运动的异常形态及形成原因[J]. 近代史研究, 2005(2): 38-77.
- [2] 陈独秀. 吾人最后之觉悟[M]//五四运动文选.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13-17.
- [3] 陈独秀.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J]. 每周评论, 1919(23).
- [4] 龚振黄. 青岛潮[M]//五四爱国运动(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131-188.
- [5] [美]周策纵. 五四运动: 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 [6] 陈独秀. 一九一六年[M]//五四运动文选.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 11-12.
- [7] 胡适. 易卜生主义[M]//胡适文集(2).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75-489.

(下转第41页)

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已觉察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记有:“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人;其得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6]588}后来又在《民众大联合》中提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6]338}。

湖湘民本传统是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源泉之一。毛泽东的群众观继承了湖湘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如肯定民众的地位——“民为邦本”,重视民众的力量,强调“爱民、养民、富民”。但它又借助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剔除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阶级局限性,是对它的合理改造和升华。传统民本思想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帝王的统治地位,而毛泽东的群众观则是在充分肯定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提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求利益,为群众服务。

参考文献:

[1] 魏 源. 魏源集: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 1976
- [2]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14诗文[M].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1986
- [3] 曾国藩全集·家书[M].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1985
- [4]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M].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54
- [5] 杨昌济. 杨昌济文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 [6]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0
- [7] 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318
- [8] 胡 宏. 胡宏集[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7
- [9] 王船山. 船山全书:第12册[M].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1988
- [10] 王船山. 船山全书:第1册[M].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1988
-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544
-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581
- [14] 张 枻. 张枻全集[M]. 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9
- [15]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M].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 1992: 2661

责任编辑: 骆晓会

(上接第33页)

- [8] 李大钊.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M]//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76-78
- [9] 刘立凯辑. 五四——六三爱国运动大事目录[M]//五四爱国运动(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498
- [10] 海上闲人. 上海罢市实录[M]//五四爱国运动(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10-21
- [11] 陈独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M]//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2-33
- [12] 李大钊. 青春[M]//五四运动文选.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37-38
- [13] 罗家伦. 答张继[M]//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90
- [14] 逸 名. 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M]//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17
- [15] 蔡元培. 《国民》杂志序[M]//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24-25
- [16] 张化冰. 浅论《新青年》作者群的形成[J]. 新闻与传播

- 研究, 2005(4): 31-34
- [17] 陈万雄.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 北京:三联书店, 1997: 17
- [18] 杨 晦. 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M]//五四运动回忆录(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219
- [19] 蔡元培.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M]//蔡元培全集(7).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199
- [20] 金林祥. 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121
- [21] 李大钊.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M]//李大钊全集(3).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223
- [22] 陈独秀. 敬告青年[M]//五四运动文选. 北京:三联书店, 1979: 1-2
- [23] 罗章龙. 椿园载记[M]//任建树. 陈独秀大传.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67

责任编辑: 骆晓会